

專題對話

反腐、公益與教育

——關於中西反腐文化比較的對話

■ 夏維朝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 梁燕城

文化中國總編輯

摘要：本次對話從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反腐開始，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高等教育情況，以及反腐背後的文化原因。中國儒家文化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不同，使中國的反腐也出現不同的方法和機制，這是需要比較和研究的，以便吸取各自的長處。

關鍵詞：反腐，文化，教育，中西比較。

通過嚴厲而獨立的審計機制反腐敗

□：夏教授，你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學院任職，長期從事財會專業的教學和研究，今天我們首先就中國政府目前在大力反腐方面的工作進行一個交流。

近期中國大力打擊腐敗，不再是某些膚淺評論所謂打擊政敵，而是真正在剷除既得利益集團，建立清廉的體制。這方面我們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也做過努力貢獻。在一九九八年，我們機構籌集一筆經費，與復旦大學合作辦了一個反腐敗的「廉政文化研究」項目，復旦大學帶有中國智庫的性質，當時上海政協第一副主席也參與，並邀得中紀委、司法局、反貪局等派人研討，加拿大道格拉斯學院也派三位法律與人權專家出席。一次在上海，一次在

溫哥華，在這兩個研討會上，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在中國，中紀委打擊腐敗的力度還是非常大的，但為什麼屢禁不止、還有那麼多人繼續貪腐？看來光靠道德的約束是不夠的，通過人治的方式是很難杜絕腐敗行為的，需要有一套機制來約束。我們注意到，在加拿大雖然也有腐敗，但有一套阻斷腐敗的制度與機制，使那些想貪腐的人都沒什麼機會。這機制是嚴厲公正的客觀獨立審計系統。

在西方有很多慈善機構，屬於NGO（非政府組織）性質，這些組織一般都接受社會捐款，但如何保證這些善款落實、杜絕腐敗的機會，也是有一套方法的。比如，捐贈人向慈善機構捐款時，慈善機構必須開具有法律效力的收據，捐贈人拿到這些收據後，可以向政府申請將所捐款項免稅，由此政府監督慈善機構，必須將捐款用到所捐贈的地方，這完全可由政府與捐贈人的監督。在西方國家，政府監督是用嚴厲的審計制度，這是很好的制約腐敗的方式。每年專業審計師都要檢查機構的收支數，收捐款多少，用在捐獻項目上有多少，其它各種開支多少，庫存多少，要一一有單據對應，保證沒有一毛錢放在私人口袋中，且要大比例用在項目上，小比例用在行政及開支上。

比如我們這個機構，屬於文化及慈善

光靠道德的約束是不夠的，通過人治的方式是很難杜絕腐敗行為的，需要有一套機制來約束，但有一套阻斷腐敗的制度與機制，使那些想貪腐的人都沒什麼機會。這機制是嚴厲公正的客觀獨立審計系統。

慈善機構在接受捐贈人捐贈的善款後，必須按照捐贈人的意願將這些善款用到捐贈人指定的項目，這是慈善活動的規則，審計就會嚴格地按照這樣的一個規則來核查查善款的流向。

靈之苦痛，關愛弱勢社群。指出信訪制原意很好，但因是上向下的官僚體制，人民只能「上訪」，且不一定受到尊重，反而增加民怨。信訪事務應改為黨中央的工作，由優秀官員「下訪」，這是防腐及保民的最好機制。還有一點，護民官不得與地方官交往，其財富受中央監管。這建議並無實現，但中央由王岐山主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二〇一三年開始，中央巡視組到各省、市、縣及國營大企業調研，反腐力度之大震憾中國與世界，基本上是我主張的「下訪」機制，成果是驚人的。

審計機制的成效

■：是的，梁先生剛才提到了一個審計的功能，如何發揮審計的監督作用來防止腐敗的問題。剛才你從慈善機構接受社會捐贈，然後再把這些善款再用到捐贈人要求的方面來說明審計的作用。審計活動對慈善類業務進行審計的規則是這樣的，慈善機構在接受捐贈人捐贈的善款後，必須按照捐贈人的意願將這些善款用到捐贈人指定的項目，這是慈善活動的規則，審計就會嚴格地按照這樣的一個規則來核查查善款的流向，檢查慈善機構到底是否按照捐贈人的意願花了這筆錢。您剛才提到的那個項目餘款的問題，按照審計的要求是，被派機構的單位會計人員首先要對善款的來龍去脈進行全面記錄，留下善款運動的痕跡，審計師則是在會計記錄的基礎上，通過會計賬目來核查查善款的使用是否按照捐贈人所要求的制度安排，如果捐贈的款項沒有按照捐贈人的要求使用，那就不符合善款使用要求，審計就會進一步追查這些資金的動向。前面您提到的項目，如果確實是將剩餘的款項用於相應項目、而且也能夠提供證據證明你將這些款項用於指定項目，那審計就會認為你的善款用得沒問題，符合規範。

梁先生剛才提到國內的腐敗問題，如何利用審計手段來遏制腐敗現象，杜絕貪

的非政府組織，在加拿大推動一些慈善公益類活動，在中國農村有大規模資助貧困學生的慈善工作，也有在中國世界各地舉辦一些學術會議、專題學術演講等公益性項目。這些項目的經費主要是通過各種管道的捐贈籌集。有一次在審計時，審計師就提出為什麼有些捐款收入與相應的支出不能完全吻合，差了幾百元不知去向，經我們核查發現，原來是在外國工作時，收到不少外僑支援的捐款，在離去前換成加幣，並一一發收據，但上機前有支持者仍捐來的少額外幣，其中有新加坡幣、馬來西亞幣、印尼幣等等。由於數額小，兌換成加幣會失去大比例的兌換價，當時是將這些各國零星貨幣帶回加拿大，登記入簿，將現金存放在辦公室中，以便後續到外地工作時的開支在當地使用。在全部款項核對相符後，審計才予以通過。這件事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審計可以發揮很大的監督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腐敗的發生。

該兩次國際研討會十分成功，中國方面展開對審計的研究，之後在胡錦濤時代，審計制度開始建立，習近平時代已成熟運用，無數老虎蒼蠅被打倒。另一成果，是三位加拿大專家到中國瞭解法治與人權後，寫下報告，說從前以為中國壓迫人權，來中國觀察及對話之後，始知中國原來不是員警國家，且對人權法建立及發展很重視。當會議進行時，加拿大的亞太部長亦在場，這些報告對加拿大政府對中國作正面評價，及建立友好的政策甚有影響。

中央「下訪」反腐機制

我們對中國反腐敗還提過另一建議，那就是在十二五規劃時，政府諮詢我們海外知識份子意見，我提出中央可考慮由中紀委建立「社會護民部」，在縣與市建「社會護民署」，獨立於地方權力之外，不具行政權，但具監督權，接受人民申訴，協調官民衝突。護民機制也與人民溝通，輔導心

中國的審計起步還是比較早的，文革時期被廢置了一段時間，文革結束後得到了恢復，到現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審計組織形式，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審計機構和審計工作。

腐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充分發揮審計的監督職能，確實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應該說現在國內在如何發揮審計作用以減少腐敗行為方面，已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並且也正在運用審計手段加大反腐力度。前兩天，新聞裏提到中國中央政府將對全國的土地出讓問題進行一次全面專項審計，這是個大事，不但是反腐的大事，也是審計的大事。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都依賴土地財政，為了滿足巨額財政支出的需要，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當地的土地資源，通過出讓土地來獲得相應的財政收入，有的地方政府的財政經費對土地依賴度相當高，很多財政支出主要是依靠土地出讓金來支撐的。地方政府將土地從農民集體手中徵收過來，通過土地的初步開發，如修路、通水等，然後整體或分片轉讓給開發商進行土地的進一步開發，有的變成住宅用地，有的變成工業用地或商業用地，這樣一轉手，政府就獲得了一大筆出讓土地的經費，形成地方政府財政資金的重要來源。但在這一過程中，有沒有腐敗的問題，比如土地出讓金是否已經全額入庫？是否存在開發商在土地出讓金之外的隱性支出，即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有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尋租？還有，收上來的土地出讓金的使用有沒有不合理的問題？最後一點，從農民集體手中徵收土地時，是否存在違規違法行為？等等，這些問題都可能是這次全國性的土地專項審計中所重點關注的方向。所以在國內，審計對於遏制腐敗方面已經並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審計起步還是比較早的，文革時期被廢置了一段時間，文革結束後得到了恢復，到現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套嚴密的審計組織形式，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審計機構和審計工作。這套審計體系具體包括政府審計、民間審計和單位內部審計，政府審計主要以財政經費收支為對象的審計活動，剛才講的土地財政問題，就是政

府審計的範疇，像我們學校，因為使用財政經費也屬於政府審計的範疇；另一個是民間審計，這個方面現在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您可以關注一下上市公司，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必須經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並出具相應的審計報告，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是獨立的，獨立性是其基本要求，也是其生存所依，當然這不排除在競爭激烈環境下有些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為了延攬業務而出現的各種違規做法，但從總體上看，民間審計在規範經濟活動、引導投資行為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外，在中國很多較大規模的單位，目前也逐步建立起了內部審計機構並配備相應的內部審計人員，其主要職責是對單位的財經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核查，是單位內部控制的重要手段，通過對單位內部的各項經濟活動進行檢查分析，對規範內部管理、明確經管責任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審計的可能缺陷

但為什麼還是有一些問題出現，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關腐敗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追究其深層次的問題，有的並不是審計本身的問題，有的則是審計本身存在的缺陷。首先，審計的依據是單位的會計賬目，所以會計賬目首先必須是真實可信的，這裏邊有兩個問題，一是會計所提供的賬目中的財務信息是否是真實的，有沒有虛假記錄？二是會計提供的賬目是否完整，所謂是否完整，講的是會計賬目是否已經記錄該單位的全部經濟業務，有沒有重大遺漏？這是審計賴以進一步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會計所提供的賬目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審計師據此進行審計而得出的審計結論也可能會存在錯誤，所以這個責任不在審計師而在被審單位的會計賬目。另外，審計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抽樣的形式，最後是通過樣本來推斷總體的可信度，既然是抽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樣

要有客現獨立的審計機制，西方這方面有較成熟的法律與專業紀律，中國也可借鏡，再配合中國文化所強調的良知，使良知與法律結合，則可使獨立專業與道德良知結合。

本與總體之間的誤差，如果審計活動中抽取樣本時，沒有抽取到錯誤的會計記錄，這樣根據樣本推斷總體時，會得出會計資料沒有錯誤的審計結論，這就是審計的差錯。根據審計規則，一定程度的誤差是允許的，所以這一點是審計本身存在的缺陷。當然，審計如何通過改進方法、提高審計技術水準，包括增加樣本數量等來減少誤差也是審計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的問題。

□：這也是我所以強調要有客現獨立的審計機制，如果審計師只是為老闆要求服務，那審計就是假的。審計師必須與老闆保持距離，有其獨立而不受干預的專業範圍，受法律及專業紀律所保護和規限。西方這方面有較成熟的法律與專業紀律，中國也可借鏡，再配合中國文化所強調的良知，使良知與法律結合，則可使獨立專業與道德良知結合。

從慈善事業看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此外，我們也談一下慈善公益事業，這在中國也極須發展，以加強富裕與中產階層對貧困階層的關愛，減少社會分化，帶來和諧。在歐美等西方社會，慈善事業非常發達，非政府組織(NGO)在西方社會經濟中的比重很大，對本國甚至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力，中國也須發展NGO以增強對世界的軟實力。

首先從政府層面上看，對於慈善事業提供免稅優惠，鼓勵民間慈善活動的發展。我們這個組織長期以來也在做慈善活動，包括通過海外華人等各種管道籌集善款，這些善款主要都是用在對中國做慈善活動方面，長期的工作是農村扶貧助學，及城市農民工助學，部份供到大學，至二〇一五年大約資助過一萬五千人次學生，有約數百人已大學畢業。也有突發工作，二〇〇八年一月中國南方冰雪災，我們在溫哥華社區籌得五十萬加元，買了二十三萬

公斤大米，派給失去農作物的農民。二〇〇八年四川五一二汶川大地震，我們及時籌集到善款七百多萬，加拿大政府也配合了三百五十萬，我們將這些善款都及時用於抗災工作，並在心靈重建上連續幫助五年。

對於我們所從事的對中國的慈善工作，及在大學支援文化學術研究與會議，加拿大政府也非常肯定，還給我們頒發了獎狀及英女皇鑽石禧年勳章。加拿大政府認為，雖然我們在加拿大本土做慈善活動有限，但對中國數十年的貢獻，加拿大政府也一樣分享榮譽，幫助中加瞭解及建立關係。

慈善事業對社會來說，具十分好的調和作用，使社會弱勢者得到關懷愛護，特別是貧困孤殘的兒童和青少年，因得到關愛，心靈狀態也改變，學會關懷其他人，減少因貧富懸殊而來的怨恨與對立。從捐贈人本身來看，社會有能力的人，可以享受政府稅收的優惠，慈善機構提供有效的慈善捐款收據，政府就會免除捐款數目的所得稅；其次有很多成功的實業家，將自己的經營所得不是留給子女而是建立相應的基金或直接捐贈，可以繞過遺產稅的門檻，遺產稅在西方國家是很重的；最後，從事慈善事業也為社會所認可，本身就能達到廣告和宣傳效應。

世界最大慈善機構之一，基督教世界宣明會，對世界貧困地區捐了百億計的錢，但每次舉行飢饉三十籌款時，都是社區大活動，一些社會名人與大批青年人飢餓三十小時，為窮人籌款，報紙電視等媒體主動大肆宣傳，捐款的個人、大企業及支持的娛樂機構都得到很大宣傳。所以在西方社會，慈善活動是一舉多得的事業。

我自己開創「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先是從學術文化上尋求重建中國文化精神價值，之後為實踐文化精神價值，開創了扶貧助學慈善公益工作，從二〇〇二年走遍西南山區，也可說是中國公益的先鋒工作。

中國近期也開始建立慈善公益機制，我們十分欣慰，但注意到發生郭美美事件，一個亂吹捧自己的不檢點少女，從有錢人得到名車名牌袋，又因該富豪與大慈善機構有關，隨意吹自己是該大慈善機構某些代表，把大機構形像搞壞。這教訓使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檢討，NGO組織有很多牽連系統和人士，都須分清許可權，小心處理數目與人士，才可成熟發展。

中國慈善事業的現況

■：是的，您剛才提到的紅十字會事件，對中國的慈善事業起到了一個直接的負面影響，現在看來這個事件本身並不複雜，但影響到中國整個慈善事業的發展。

在中國慈善事業其實也有不少，早期的包括宋慶齡基金會和紅十字會等慈善活動也有一定的影響，現在大家經常看到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标先生，也做了大量的慈善活動，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在香港地區，我們注意到邵逸夫先生所做的慈善事業，老先生在國內很多學校都有捐建項目，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就看到逸夫樓，很多高校都有逸夫樓，甚至在我老家的一個縣城高中，也有看到逸夫樓。李嘉城先生也有很多捐助，我知道汕頭大學就有他很多捐款，他對香港中文大學也有很多捐助，我在順德看到了梁詠瑤中學，那也是香港的梁詠瑤博士捐資興建的。

中國政府也是鼓勵慈善事業的，並有相應的稅收優惠，如果企業有捐贈支出的話，提供有效證據，稅務機關可以免除相應的所得稅，但中國在慈善事業和西方國家相比還是很落後的。其實中國也不是沒有富人，而且從絕對數上看並不比西方哪個國家少多少，因為中國人多。當然從事慈善捐款也不光是富人的事，但我認為中國的慈善事業本身也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我曾經接觸過深圳紅十字會的一位會計人員，她就說，在她單位有一個很好的信息披露方式，定期會將捐贈人的捐贈信

息以及善款的使用情況進行公佈，對於那些不願意留名的捐款者，如果他想要知道捐款的去向，也可以提供相應的信息查詢。這件事給我印象就很深，我想如果中國的慈善機構在信息披露方面進一步改進，比如剛才講的定期公佈信息，或者能夠提供讓捐贈人查詢善款使用的管道（現在的網路很發達，做到這一點在技術上是沒問題的），這將對中國的慈善事業起到很好的推進作用，現在很多人不願意從事慈善捐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透明，捐款人不知道自己的捐款到哪裏去了。紅十字會事件發生後，有人就猜測這些善款可能是讓類似郭美美的姑娘去炫富了，事實上應該是誤解，但紅十字會的這個事件確實對中國的慈善事業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我有時候也在想，好像中國很多人並不熱衷於慈善事業，要說捐助，那也是有的，比如兄弟姐妹之間的相助、甚至親戚朋友之間的捐助，在中國也很多，經常看到類似哥哥姐姐外出打工，將打工所得寄回家裏供弟弟妹妹完成學業的新聞報導，但中國人的幫助好像更多地都是在距離自己比較近的人之間進行，互不相識的人之間的捐助卻不多，沒有做到社會化。我覺得慈善事業應該是個社會化的事業，是通過專業的仲介機構在運作的，應該是捐助者與受捐者之間沒有直接關聯的，而不僅限於小圈子之間的捐助，這應該是文化方面的差異。

□：是的，這就是中國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間的不同。儒家文化講的是「推愛」，儒家的愛首先會從自己親近的人、從自己身邊的人開始，依次外推。《孟子·梁惠王上》就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典型的儒家文化中的「推愛」思想，先幫助親近的人，然後再外推到其他人；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則不同，講的是「博愛」或者叫「無條件之愛」，《聖經》上講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

慈善事業應該是個社會化的事業，是通過專業的仲介機構在運作的，應該是捐助者與受捐者之間沒有直接關聯的，而不僅限於小圈子之間的捐助，這應該是文化方面的差異。

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屬於精英教育階段，之後則屬於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培養的人才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高等教育還有不小差距。



上，他不是為了自己的家人，也不是為了猶太人去受難，他是為了全人類而去承擔痛苦，所以這種愛是無條件的，無論誰都應當去愛他。

中國高等教育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

□：我在中國多所高校講過學，前後也二十年，我親自見到大學的改進，從建築物到學術水準，都有很大提高。但又仍有很多問題，如文化產業取代學術研究，無足夠學歷的人可憑關係升上高位，領導層看政治高於學術，有錢或有權人可請槍手寫論文而得博士學位等。夏教授，你是長期從事高等教育的一線教師，應該說各國的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直接為社會培養所需的建設和管理人才，所以高等教育對一個國家的影響就更為顯著。這次你來加拿大做高級訪問學者，也是要瞭解和考察加拿大的職業教育情況，通過你的觀察，你認為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和中國的高等教育的主要差異是什麼？或者說，對照歐美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中國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是的，提到中國的高等教育，與歐美等國家相比還是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這次能親身體驗，感覺更加明顯。

應該說從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至今，中國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驚歎的成就，

按照國際通行的百分之十五入學率標準，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屬於精英教育階段，之後則屬於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培養的人才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高等教育還有不小差距。

我是一線教師，看到的都是具體的事情，從查擺問題的角度出發，中國目前的高等教育還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我概括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目前的大眾化教育時代仍然延續精英教育的「高大上」的培養目標。如果梁先生有機會接觸中國高校各專業的培養目標，您會發現都有一個關鍵詞，就是要「培養某某專業高層次專門人才」，高校各專業都以培養高層次人才為己任。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時代的培養目標。現在已經進入大眾化教育時代了，怎麼可能高校的畢業生都是高層次人才呢？所以我覺得這個要調整，要讓培養目標更接地氣。二是高校管理事務繁雜。很多高校對教師實行「工廠化」管理，把教師當成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在管，高校的人員管理普遍採用量化考核方式，從教學、科研、學生工作到社會服務，一律量化，折算成工作量，然後加計算成分值，並據此來對教師進行評價。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忽視了教師的能動性，同樣一節課，不同的教師教出來的效果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方面如

美國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中國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從本質上都強調生活和教育的一致性，教育必須走向社會，社會、學校、家庭共同承擔起教育的責任，特別是思想品德教育。

何體現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對學生的管理，基本上是採取「保姆式」管理，在中國高校，學生從進校開始，學校要對學生的學習、身心健康、思想品德負責，學校要建食堂，建宿舍樓，安排學生的吃和住。所以在中國高校做行政管理，很忙、很辛苦，管的事越來越多、越來越雜，還有大量的會議要參加，還要研究文件、撰寫材料，其結果是，高校行政化越來越嚴重，講究行政級別，也有部分行政人員越來越官僚。三是高校教師很忙很努力，但越來越功利化。二〇一三年有一條消息，浙江大學對兩位潛心從事課堂教學工作的教師每人獎勵一百萬元，與此相對的是二〇一四年發生在清華大學，學校對兩位長期沒有申報高一級職稱的教師調離教師工作崗位，這兩則消息正好說明一個問題，現在高校的教師潛心從事教學工作的越來越少、也越來越不被學校認可，所以教師都爭著去做科研、爭著去從事社會服務，因為量化考核中教學部分是相對固定的，而科研部分是有很大成長空間。四是學生很酷很聰明，但越來越厭學。很多學生所學的專業並不是自己喜歡的專業，也可能是獨生子女的問題，現在很多大學生在選擇專業時都為父母所左右，有的甚至是父母直接替他選的，進校後發現並不是自己喜歡的專業，而按照目前的管理體制，很難重新選擇或更換自己喜歡的專業，這就造成了喜歡的專業不能學、不喜歡的專業必須學的現象，有的學生就會厭學，因為他是在為父母學，不是為自己學。

□：在加拿大這方面有不同文化，如中國文化視兒女是父母的產業，故兒女的前途要滿足父母的需要，西方文化視兒女是上帝交給父母來託管的，故兒女有自由自主性發展自己，只對自己負責，不必滿足父母要求。就學生管理而言，中國較家長式，重關係之密切，為其好而有很多代其安排的方式，西方的高校一般都不太理會其

私人意願，放任其自身自滅，一般不會安排學生的吃飯和住宿問題，宿舍及飯堂是另一行政管理系統，學生需要自己解決吃和住，學校是不管的。公立大學只管教學，只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傳授職業技能，並不教育學生的理想與做人意義，也不理其道德操守。只有認真的教育大學才關注學生的理想人格，一般公立學校是不能保證這個學生能不能最後成才的，一切在乎學生自己抉擇。

理想教育三層次

我認為理想的高等學府應有三層次。首先的一個職能是培養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使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所以應當把主要的教學時間用於專業課程的教學組織上，要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裏學到更多對他們將來的就業和個人發展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上。第二層次，是栽培學生對社會現實有認識，也有道德人格的啟發，使其成為有良知而又守法的人。像香港中文大學，還有部分通識類教育，讓學生對走向社會具有所需的社會知識、人際溝通及做人道德等方面有一定的接觸和瞭解，並有利於其未來的發展。第三層次是精神內涵，包括高層次的哲學反思、愛心公益、關懷行動、靈性修養等。

在高校的管理機制上，香港這方面就做得比較好。目前在中國，香港的幾所大學也算是頂尖的學校了，香港大學國際排名二十多名，中文大學三十多名，內地的北大和清華都在百名之外。香港大學其實是完全西化的，從學校管理到學術自由基本上按照歐美西方那一套在做，香港中文大學有著部分儒家文化的背景，但也有很好的學術自由，香港浸會大學則是西方體制基督教精神，這種西方的學術自由的體制對一個大學是至關重要的。

調整和提高是目前面臨的迫切任務

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還在延續古代培養士大夫的形式，這還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這種教育在古代是有功效的，但現代教育也須栽培專業知識、獨立思考、博大學養與胸襟、及對真善美的體悟等。

說就很差，有的根本無法達到真正以外語進行日常溝通的目的，這還就罷了，關鍵是很多人學完外語，根本就用不上。雖然現在國際化程度在增加，但很多人是沒有機會直接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所以也不需要那麼多外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浪費，是對整個中國人力資源的一個巨大浪費。如果把這些精力用在專業課程或技能方面，可能更有利於學生們的個人發展。當然外語不是不重要，對有些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從事國際貿易或進行研究等等，所以在大學裏安排外語類課程是必要的，但應當有更多有彈性，給學生更多的自主選擇權。

我在比較加拿大的職業教育和中國的職業教育後發現，應當在對教師管理和學生自主學習方面需要做一個大的改進，我感覺這也是進一步提升中國目前高等教育內涵建設的關鍵所在。加拿大這邊大學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有著絕對權威，學校通常不會干預教師的課堂教學，未聽說有學生考試不通過回頭怪教師沒教好的現象，學校也沒有對課程通過率、畢業率之類有什麼要求，這樣可以讓教師專心做好教學工作而不受學生和學校管理層的干預，教師也更有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個就是學生的自主學習問題，如何讓學生主動學習而不是被迫學習，除了需要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外，應該讓學生對學習成本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中國我們一般是採取學年制，學生按照學年或學期交費，至於該學年或該學期應該上哪些課程、由哪些教師來授課，學生沒有選擇權，你學校怎樣安排我就怎樣學習就是了，所以很被動。但我在加拿大觀察到的情況完全不同，學生每學期在開學前需要自主選課、選擇授課教師，然後按照所選的課程來交費，選了幾門課就交幾門課的費用，學生自己很清楚，如果所選的課程最後考試沒通過，後面還需要再次交費來重修，他很清楚不學習的代價，那就是再交一次費用，這一點

■：對照香港和加拿大的大學情況，我覺得中國內地高等學校在很多地方都需要進一步改進。比如，在課程設置上，是不是應該有那麼多專業課以外的課程安排，現在思想政治類課程、外語類課程佔用了大量的大學課堂時間，我沒做過具體統計，估計約占四分之一左右的課時份量吧。不是說這些課程不重要，因為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不僅僅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品德教育同樣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不是一定要放在大學課程裏講授，我感覺放到課程之外去完成效果會更好。我在加拿大的大學課程裏沒看到思想政治類課程，但加拿大的學生在這方面的教育也是有的，不在大學課堂上完成，而是放在社會、交給家庭，社會、家庭和學校共同組成了一個人才培養的環境。美國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中國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從本質上都強調生活和教育的一致性，教育必須走向社會，社會、學校、家庭共同承擔起教育的責任，特別是思想品德教育。我是從事財會專業教學的，誠信是財會工作的基本要求，但誠信教育在大學課堂上是很難完成的，你不可能通過出試卷考試來確認學生的誠信是不是合格，所以不如直接交由社會或家庭來完成。在加拿大我注意到坐公車的問題，我沒看到乘坐地鐵有查票的，出入閘口也一直是開著的，乘客可以自由出入，但好像都很自覺購票，因為大家都知道，一旦無票乘車被發現，其罰款將是非常高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誠信教育，如果一旦失信，將付出高昂的失信成本，會給失信者以切膚之痛，相信這是在課堂教學中所無法達到的教育效果。外語課程也一樣，現在中國的學生從幼稚園開始學英語，到讀研究生還要繼續學英語，佔用了大量的青春和精力。由於在課堂教學中很難構建真實的外語環境，所以課堂外語學習的效果並不理想，很多是啞巴外語和聾子外語，閱讀、書寫還行，但聽、

和中國的高校不同，成本是透明的、可視的，所以我倒是覺得這些方面都可以進一步來改進。

□：在對中加高等教育進行比較後，是不是可以這樣概括，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的幾個方面，一是家長式教育，上頭決定一切，學生的自我發展能力比較弱；二是官僚化管理還比較多，把教師和行政人員變成工具一樣在管；三是在一定程度上還在延續古代培養士大夫的形式在培養當今的人才，學生的出路最好是能當官，而且地位確定論，講究出身，從什麼樣的大學出來就代表了自己的身價，這還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具體體現。這種教育在古代是有功效的，但現代教育也須栽培專業知識、獨立思考、博大學養與胸襟、及對真善美的體悟等。

培養人才，構建立交橋

■：您的概括畫龍點睛，應該說我們剛才討論的這些問題，是從查擺問題的角度來比較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歐美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差距，客觀地講，中國的高等教育這些年來的成就還是有目共睹的。從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至今，培養了幾代中國大學生，也正因為中國高等學校這些年來為社會輸送了大批國家建設和管理的人才，中國才有了今天的發展成就。雖然目前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我們注意到在很多方面都在改進、都在向好的方面變化。我在深圳工作，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我注意到這裏學生的整體素質還是很高的，智商高、精力旺盛、好奇心強、能夠快速接受新事物、並樂於嘗試，而且我還發現他們的情商也很高，這些都是好事，是他們未來個人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推手。昨天我看到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則消息，提出中國教育改革的總目標是「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構建銜接溝通各級各類教育、認可多

種學習成果的終身學習立交橋」。特別是構建人才培養立交橋目標，因為我在職業類院校工作，日前中國的職業教育雖然體量夠大，但總體上還被認為是比研究型大學低一等。這種認識實際上是錯誤，因為人才是多元的、人才培養的管道也是多樣化的，應用型技能人才和研究型人才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同樣重要，而且培養應用型人才正是中國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農村、工廠、商店、街道是高技能的一線生產、服務和管理人才的廣闊天地，現在提出打通現代人才培養的立交橋，這必將對中國今後若干年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深刻而長遠的影響，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的職業教育正面臨一次大發展的機遇。所以我們在肯定中國高等教育過往成就的同時，也欣慰地看到這些變化，相信假以時日，再過五年甚至十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必將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時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也必將是今天所不可比擬的，所以海外華人也一定更加以為中國人而榮。

On Combating Corruption:
A discourse between culture and
education.

Xia, Weichao (Shenzhen Polytechnic)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is discussion is about the current anti-corruption drive in China and how it has affected high level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the cultural reasons behind the anti-corruption drive. Confucia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 western culture also differ in their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corruption and this deserves deeper attention going forward in order to improv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anti-corruption methods.

Keywords: Anti-corruption, culture, education, sino-western comparison.

相信假以時日，再過五年甚至十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必將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時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也必將是今天所不可比擬的，所以海外華人也一定更加以為中國人而榮。